

《聊斋志异》“痴者”形象探赜

张 迎, 霍正达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聊斋志异》书写了众多“痴者”形象,且类别多样,如赌痴、情痴、科考痴、书痴、酒痴、棋痴、琴痴、菊痴、石痴等,以上构成了该文本的“痴者”群像。造成“痴者”形象的成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指蒲松龄在淄川县进行的亲友交往活动以及具体家庭生活;内部因素指蒲松龄自我的人生经历,比如科考、幕僚、设馆授学经历等。并且,蒲松龄小说中关于棋、琴题材的创作书写,在形象设定、立意取向、心理解剖、结构安排、接受效果及作家精神上均较前人有所超越。

关键词:《聊斋志异》;“痴者”形象;超越

中图分类号: I2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437(2026)01-0065-08

《聊斋志异》共有约五百篇文言短篇小说,其中对于“痴者”形象的描写值得关注。在分析“痴者”形象类型方面,徐文军《〈聊斋〉痴说》认为,《聊斋志异》中的“痴者”分“真痴”与“假痴”两大类,其中“假痴”亦称“性痴”,“性痴”之下又分五小类^[1]。分析“痴者”形象成因方面,张晓萍的硕士论文《〈聊斋志异〉中的痴狂人物群像研究》结合蒲松龄实际生活经历以及蒲文、蒲诗对《聊斋志异》痴者形象书写成因作出合理阐释^[2]。基于此,笔者意在分析痴者形象类型,并结合蒲松龄地域生活及个人生平经历对其成因作具体深入的讨论;并以棋痴、琴痴形象为切入点,与前代同类题材小说比较,分析蒲松龄在进行棋、琴题材的小说创作时的行文突破。

一、“痴者”形象释义与类型分析

何谓“痴”?《说文解字》释:“不慧也。”^[3]徐锴云:“痴者,神思不足,故亦病也。”^[4]段玉裁言:“心部曰:‘慧者狷也。’犬部曰:‘狷者急也。’痴者,迟钝之意,故与慧正相反。此非疾病也,而亦疾病之类也,故以是终焉。”^[5]与之相照,《世说新语·赏誉上》曰:“王蓝田(述)为人晚成,时人乃谓之‘痴’。”^[6]学者李诤在此基础上认为“痴”逐渐衍生出其他含义:一是近于癫狂的精神病态,二是对某事物的执迷、沉醉^[7]。那么何谓“痴者”?李诤解释,痴者执着于生活的某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追求心之所好^[7]。《南史·谢灵运传》云:“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颞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8]350}陆游《冬至后一日书》:“痴人痴到底,更欲数期颐。”^[9]由此可见,“痴者”,乃是因爱好某事、某物以致痴迷不舍甚至引发癫狂状态的一类人。由此,我们结合《聊斋志异》

收稿日期: 2025-12-22

作者简介: 张迎(1998-),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霍正达(2007-),男,山东曲阜人,山东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文本，对“痴者”类型进行具体分析。

赌痴，指那些嗜赌成性之辈，他们为获取金钱，不惜放弃尊严，打破道德底线，使用赌博的手段，企图谋取暴利。《聊斋志异》中有不少赌徒形象。

《任秀》篇写主人公嗜赌成瘾，一日，泊舟江上，夜闻骰声，技痒难熬，又思母训，即复搁置。然苦不可眠，起解者再三，终携钱赴往^{[10]1474}。但明伦旁批：“写尽赌博者之神魂，绘出嗜博者之形态，先生似曾亲眼见来。”^{[10]1474}《云翠仙》篇写赌徒梁有才日日与“无赖朋饮竞赌”，赌资无有，乃盗妻之簪珥，后竟欲卖妻以赚赌资^{[10]750}。《赌符》篇述一人参与赌博，大亏，又将田产典压，尽丧，此事韩道士知之，乃授其赌符，令得获故物即返，其人诺之复赌，果赢旧物，然赌不可止，博而又博^{[10]419-420}。但明伦批注：“果然得陇望蜀，盖赌局中无有不贪者。”^{[10]420}观此三篇，蒲松龄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描绘了赌徒的沉沦表象，更以赌博为棱镜，折射出人性在贪婪与失控深渊中的挣扎与异化，揭示“赌痴”实为“心魔”的外化。

情痴是《聊斋志异》中书写较多的“痴者”类型。他们或男或女，皆是情种，往往对爱恋对象一见钟情，又因暂时的婚恋挫折而思慕成疾，为情所困，如《香玉》篇中的痴女香玉。但明伦评价：“种则情种，根则情根，苞则情苞，蕊则情蕊。忍风雨以待君二句，无限深情，一时全绽。”^{[10]1554}《寄生》篇中寄生、闺秀与五可的三角恋情也堪称痴情。无怪但明伦称寄生为“痴公子”。可见，蒲松龄笔下的情痴，不仅挑战世俗礼法，更在生死临界处叩问“情”能否超越形骸、时空乃至生命本身，将“痴情”升华为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存在主义抉择。

科考痴指那些痴迷于场屋，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落拓书生，科举成为束缚他们精神的无形枷锁。科考痴的典范之作为《叶生》篇。该篇首先叙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又写其所遇不偶，困于名场。丁乘鹤爱其才，邀叶生以师名授其子，其子赴试，中亚魁。丁感叹曰：“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若何！”叶生答曰：“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后叶生领乡荐，仆马开道，送生省家。而妻见生，惊惧骇走，言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勿作怪异吓生人。”生闻言，“逡巡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10]82-83}蒲松龄以叶生魂灵赴考的荒诞情节，刺穿科举制度吞噬个体生命的

残酷本质。叶生的“痴”实为制度性压迫下士人精神扭曲的悲壮投射，揭示出功名执念异化为桎梏枷锁的社会悲剧。此外，《司文郎》篇中的宋生、《于去恶》篇中的于去恶，均与叶生同出一脉。

书痴，指刻板读书，沉湎于书文教条，并信为箴言，尤且不自知者。《书痴》篇写主人公郎玉柱嗜书如命，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于是“昼夜研读，无问寒暑。年二十余，不求婚配，冀卷中两人自至。见宾客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朗声大作，客逡巡自去”^{[10]1453}。可笑的是，他又将偶然事件或不相关之事与所信箴言相联系，“踏地陷足”“穴有腐草”“掘之，乃古人窖粟”，益信“千钟”之说。攀登高架，得金辇，以为“金屋”之验，后生献辇为佛龕，观察赐之“金三百、马二匹”，以为金屋、车马之说皆得以验^{[10]1453-1454}。年过三十，有人劝之娶妻，其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由拒。但明伦感慨：“写书痴可云穷形尽态矣。”^{[10]1457}郎玉柱并非真爱知识，而是沉溺于对书本的形式崇拜，其行为以荒诞喜剧的外衣，包裹着知识拜物戕害个体认知与生命体验的深刻悲剧。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痴者形象值得关注，他们既不把人生追求放置在生理欲望或恋情对象上，也不把功名富贵看作毕生目标，而是寻找积极且自洽随性的生活方式，以精神的丰盈为最终旨归。符合此类特性的痴者形象有酒痴、棋痴、琴痴、菊痴、石痴。

酒痴如《秦生》篇：秦生做药酒时，不慎将毒药投放其中，秦生不忍倾弃，“封而置之”。后年余，秦生夜起思饮，无所得，忽忆药酒，启封闻之，芳烈扑鼻，“取盏将尝”，其妻苦劝，生言：“快饮而死，胜于饥渴而死多矣”，遂饮而死^{[10]598-599}。如此酒痴，冯镇峦评曰：“拼将一死消饥渴，殁去犹堪作酒仙。”^{[11]176}

棋痴如《棋鬼》篇：晨起，梁公于山林间游玩下棋，遇一棋鬼，与之对弈。棋鬼负而又负。初负，“神情懊热”。次负，“愤慚”。赐之酒，不饮，“惟曳客弈”，不觉日薄西山。梁公又从通神差役马成口中得知，棋鬼因下棋延误还阳日，“永无生期矣”^{[10]532-533}。对此棋痴，蒲松龄评曰：“见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见奕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获一高着，徒令九泉下，有长死不生之弈鬼也，可哀也哉！”^{[10]533}何守奇评之“癖性不改”^{[10]533}。但明伦则在篇末评点生

动还原现实生活中痴迷下棋者的行为状态，从而与蒲氏之文相呼应，“乃自晨至暮，心力俱竭，目无旁睹，耳无他闻，汗湿津津，相持不下，且夜以继日，废寝忘餐。”^{[10]533}

琴痴如《局诈》篇第三则故事：李生得一古琴，对其珍爱有加，“若获拱壁，贮以锦囊，藏之密室，虽至戚不以示也。”^{[10]1032}程邑丞亦好此琴，其花三年时间，以琴艺与李生交，辅以美人计迷惑之，终得琴而去。李生待琴，已是一痴，而比之邑丞，尤显逊色。冯镇峦批：“癖也，亦近乎痴也。”^{[11]305}

菊痴如《黄英》篇。马子才，好菊，“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10]1446}后得稀有之菊种，裹藏如获至宝。又遇少年（实菊妖），悉得培育之法。冯镇峦评价曰：“物聚所好……癖如花者，百卉缤纷。马子才之感动花精有以也。”^{[11]433}

石痴如《石清虚》篇。邢云飞，好石，一日得奇石，如获异宝。初放外室瞻观，后因窃而复得，乃供于内室，如有观焉，先焚香而后出之，有尚书以百金之报求之，邢谓来人“万金不易”。后有仙叟索要奇石，言石为己物。邢叩拜之，盼其割爱。叟许之，但须减其阳寿，邢慨然而应^{[10]1575-1578}。冯镇峦评此人：“此君可名石痴。”^{[11]472}蒲松龄评价：“至欲以身殉石，亦痴甚矣！”^{[10]1578}

纵观酒、棋、琴、菊、石诸痴，蒲松龄实则构建了一个超越世俗理性的“痴者宇宙”。虽然这类痴者也是将特定对象奉为生命唯一圭臬，甘愿为之以火焚身。但是这种“痴”，既是对人性执念深渊的勘探，更是对主流价值（如功名、实用、礼法）的叛逆性宣言。它宣告在个体灵魂深处，某些非功利性的迷恋与献祭，足以构成对抗虚无、定义存在的终极意义。

二、“痴者”形象成因

探求蒲松龄笔下“痴者”群像书写成因，应以其人生轨迹为切口进行具体分析。

《任秀》《云翠仙》《赌符》等篇所写嗜赌成瘾的赌痴形象，他们皆不能克制金钱名物的诱惑，进而丧失人的高尚品格，成为被物质世界支配的非人。“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先生十九岁。是年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施闰章”^{[12]9}，此时蒲松龄踌躇满志，声名大振，常跟身边友人吟诗唱和。在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

邑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结郢中诗社”^{[12]10}。蒲松龄凭借威望为诗社撰写了序言《郢中社序》，其中有言：“而窃见酒棚赌社，两两相征逐，笑谑哄堂，遂至如太真终日无鄙语；不则喝雉呼卢，以消永夜，一掷千金，是为豪耳。耗精神于号呼，掷光阴于醉梦，殊可惜也！”^{[12]11}由以上序言可知，蒲松龄曾亲眼目睹过聚众赌博之情形。他认为那些豪赌之人白白浪费大好光阴，虚度年华，让自我精神空间长期处于贫乏状态，是十分可惜的。所以，蒲松龄在《赌符》篇末的“异史氏曰”中对赌博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说：“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博；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将不知所底矣。”^{[10]420-421}

青年蒲松龄对赌博的强烈批判，不仅源于道德义愤，更深植于其早期功名成就所塑造的“时间价值”信仰。他将“光阴”与“精神”视为士人立身的核心资本，而赌博正是对这种资本的毁灭性挥霍。蒲松龄目睹“醉梦耗神”的切肤之痛，成为其日后在《聊斋》中解剖“赌痴”心魔的原始驱动力。

《瑞云》《香玉》等篇刻画许多痴男怨女，这类形象对爱情有着极度的渴望与专注。蒲松龄写这些痴男怨女的灵感来自个人的情感经历，他对“情”有深刻的理解。他长期在外，家事全赖妻子刘氏。不仅如此，刘氏对蒲松龄科举失利也从无怨言，反而给予他慰藉与鼓励^[13]。刘氏去世后，蒲松龄先后作十余首悼亡诗以示怀念：“一自长离归夜台，何曾一夜愁看来。忽然含笑褰帷入，赚我朦胧睡眼开。”^{[14]1950}若蒲松龄对妻子无至真至深之爱，便不会盼望妻子入梦，更不会对梦醒时分产生怅然若失之感。兹可证明，妻子的离世，让蒲松龄对人世之情有了崭新的体悟。

另外，孙蕙之妾顾青霞的出现照亮了蒲松龄单调乏味的幕僚生活，成为他的红颜知己。为迎合顾青霞的诗歌喜好，他在公务间隙，精选唐人绝句赠于她，并作诗以记：“为选香奁诗百首，篇篇音调解当驛。箫能唱处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14]1580}

“可儿”在这里指令人喜爱、欣赏之人。顾青霞于蒲松龄而言，无疑是这样的存在^[13]。蒲松龄在顾青霞病逝后写下情真意切的《伤顾青霞》。诗曰：“吟声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14]1725-1726}据此可知，顾青霞其人之于蒲松龄的重要意义。

蒲松龄的私人情感图谱实为书写情痴的熔炉。

对刘氏的愧疚与追思,赋予其笔下情痴以深沉的责任伦理底色;而对顾青霞的克制隐藏之爱,则淬炼出超越世俗桎梏的精神烈度。正是这种亲历的“情之两难”,使他能洞悉情痴灵魂中奉献与缺憾交织的永恒悖论,并将“情”升华为对抗生命有限性与伦常宿命的创作美学。

科考痴一心扑在场屋之上,期望早日拔得头筹,获取功名权势,实现人生价值。一般意义上讲,科考痴也是另一种程度的书痴,想要顺利通过科考,唯有“读万卷书”,书痴便作为科举制推生的“产品”而得以“售卖”人间。而蒲松龄塑造科考痴和书痴形象的原因,与他本身的家庭环境与个人遭遇有密切联系。

先看蒲松龄的家庭背景与科考历程。《蒲松龄年谱》记载:“先生高祖世广,邑廩生,赠文林郎。少聪慧,才冠当时。……曾祖继芳,邑庠生。祖生汭。父槃,字敏吾。少肯研读,文傲陶鄧,器识超远,淹博经史,虽终困童子业,宿儒无其渊博。值明季乱,遂去而贾。……然闭户读经史,不以贫为虞。”^{[12]1-2}可见,蒲氏家族历来视科举求官为首要人生目标,高祖、曾祖均有入仕履历。蒲松龄之父痴迷科举,学识深厚,但科考不顺,又逢明清易代,遂弃文经商,归家后仍嗜书如命。由此可见,蒲父是科举与书籍的狂热追求者。因此,他将家族希望寄予子女,盼其早日完成自己未竟之梦想。于是对诸子“躬亲教之”,而六子中唯有蒲松龄悟性最高,“经史过目辄了,父最钟爱之”。

蒲松龄起初也不负所托,参加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获得同乡赞誉,声名远播。但此后数十年,蒲松龄参加乡试却屡屡不中。一直到七十二岁,他才获得所谓拔贡生的虚名。由科考的顺遂到逆境,这漫长的年华所经历的辛酸,蒲松龄深有体会,他因而写下大量有关科考的诗作。其中,有勉励之作,如“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有叹命之作“龙门御李真欺我,世上何人解怜才”;也有自嘲之作“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2]故而,蒲松龄也跟父亲一样,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科考痴和书痴。他在《叶生》篇末所言“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10]84-85}也是他本人的心声。最终,蒲松龄像父亲那样将未能实现的科举心愿寄托在后人身上。

综上,蒲氏父子的科举迷途,实为明清士人精

神困境的微观镜像。科举不仅是功名阶梯,更内化为一种近乎宗法家族形态的“救赎”仪式——父辈以未竟之志为愿景,子辈则以生命年华为代价进行继承。这种代际传递的“科考痴”,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异化,吞噬个体价值,扭曲家族命运的严重弊病。

本文将酒痴、棋痴、琴痴、菊痴、石痴的形象成因归为一处进行讨论,原因在于他们痴迷的对象皆是为满足内心以个人价值本位为主的快乐哲学。酒、棋、琴、菊、石各自蕴含着深广的文人意蕴。

蒲松龄拥有嫉恶如仇、热情洋溢的高尚、豪放人格,其诗歌《聊斋作》有诗句曰:“脂韦福之阶,狂直祸所丛。疏懒嵇叔夜,佯狂阮嗣宗。”^{[14]1670}以魏晋名士嵇康、阮籍来隐喻自我高洁人格。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与孙蕙》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孙蕙之妻去世。蒲松龄闻讯寄诗相慰,诗云:“闻君失所爱,惊坐汗交颐。”又劝慰孙蕙“但愿加餐饭,英雄性不羁”“还应鞅掌酬圣明,切勿灰心决去留”,感情朴素真挚^[15]。孙蕙升迁后,其党羽欺压百姓、横行乡里。蒲松龄不满其行,写信直谏孙蕙,致孙难堪,两人友情自此破裂。蒲作《读〈绝交论〉》“虽有杵臼交,不如同根者”^{[14]1662-1663}。正如其子蒲箬评价说:“即平素交情如飴,而苟其情乖骨肉,势迫乡党,辄面折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指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已为此吾所无愧良朋者也者。”^[16]另外,蒲松龄还凭吊过超然台。“超然台,在今山东省诸城市北城,北宋苏轼任密州太守时在旧址上重建,并写有《超然台记》记述其事。”^[17]蒲氏所作“学士风流贤邑宰,令人凭吊独徘徊”句,由衷表达了对苏轼的敬仰之情。苏轼一生坎坷,官场几度沉浮,但他豁达于人世,恒久立于不败之地。蒲松龄坎坷的人生际遇、高洁傲岸的性情与苏东坡极为相似,自成一股豪迈奔腾之气。

这种由魏晋风度与东坡精神推熟的奔放高洁性格也影响到他的喜好,比如饮酒。他曾记言:“余少时,最爱《游侠传》,五夜挑灯,但以一斗酒佐读。”^{[14]1119}此番情境可谓豪侠任气,别有生趣。另外,蒲松龄还亲作《酒人赋》,文中说酒可“以宴嘉宾,以速父舅,以促膝而为欢,以合卺而成偶”,还可以“钓诗钩”“扫愁帚”^[18]。在《郢中社序》中他也毫不掩饰对酒的喜爱,“然酒茗之燕好,人人有之”^{[12]11}。据学者考证,蒲松龄现今存世的一

千余首诗词中,涉及饮酒内容的大约二百一十首,占诗词总量的五分之一^[19]。《饮希梅斋中》描写他与挚友李尧臣把酒言欢的情形“樽酒狂歌剑气横,壮怀喜遇故人倾”^{[14]59}。《赠毕自韦仲》组诗中记有他酩酊大醉的文字“高馆适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14]211}。除此之外,蒲松龄做幕宾以及坐馆教书,也都少不了宴饮酬应。因之,蒲松龄对酒的深度体验与文学书写,实则是其生命张力的两极投射。作为“钓诗钩”的酒,是寒士在困顿中激活诗性、维系友情的生命暖流;而作为“沉沦渊薮”的酒,则是他洞见欲望如何吞噬理性的警示寓言。他既是酒趣的享受者,又是醉狂的解剖者,这种亲历者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使其笔下的“酒痴”兼具酣畅的诗意与惊心的悲剧深度。

蒲松龄有许多描写菊花的诗作,如《十二日孙圣佐见招赏菊》:“登堂把酒对黄花,老子颠狂意兴嘉。”^{[20]649}蒲松龄还常携亲友登高赏菊,有诗作《登台共饮》《九日同孙圣华、圣文昆仲,齐河许圣瑞及儿孙登东山》等传世^[21]。由此可见,他对菊花的偏爱之情。再由蒲松龄所作《十月孙圣佐斋中赏菊》:“我昔爱菊成菊癖,佳种不惮求千里”^{[20]615}可知他“千里求菊”的痴癖,绝非仅止于风雅玩赏,实为寒士在功名困顿中重构精神高地的象征性实践:菊花承载的傲霜之骨与隐逸之姿,成为其对抗科举异化的坚实武器。这种痴迷投射于《黄英》,便升华为对文人身份危机的深度寓言——马子才的清高与黄英的入世,实乃蒲氏自身“菊魂”与“俗骨”分裂的文学投射。

蒲松龄不仅是菊痴,也是石痴。石隐园是明清之际淄川县毕氏家族的私家园林^[22]。因园林中多奇状之石,因此得名。蒲松龄在毕府留宿教书,所以,他更有条件直接接触此园,创作诗句,其《咏石隐园》即是如此。此外,石隐园中的十块奇石,蒲松龄也尤为关注,并挥毫泼墨,为它们题诗^[23]。另外,蒲松龄在毕府居所中还保存一块奇石,名“蛙鸣石”。蒲松龄时常爱不移目,并赋诗以表珍爱:“老藤绕屋龙蛇出,怪石当门虎豹眠。我以蛙鸣间鱼跃,俨然鼓吹小山边。”^{[14]1883}蒲松龄除为奇石题诗,还专门撰写《石谱》一书,书中对各类奇石的产地、成因、特色等都作了叙述^[23]。

蒲松龄对石隐园奇石及“蛙鸣石”的痴迷与书写,绝非仅是文人雅趣的投射,实为其“物性观照”哲学与文学想象力的核心实践。他将奇石视为凝固

的自然精灵与历史见证,通过命名、题咏与谱录,赋予顽石以人格化的生命。这种深度的物我交感与文本化建构,在《石清虚》中得到淋漓的演绎。小说主角邢云飞“好石”成痴,其与灵石“石清虚”生死相随的奇缘,正是蒲松龄现实“石痴”情结的极致艺术呈现。

关于蒲松龄在作品中塑造棋痴与琴痴形象的原因,可从其生活环境和性情创作中探寻。其一,蒲松龄身边不乏崇尚高雅的文人,他们中或有棋琴爱好者;其二,蒲松龄的红颜知己顾青霞琴艺高超,或为他创作琴痴故事提供素材;其三,他对菊花、异石的痴迷,这种情感可移植到棋琴意象之上;其四,《聊斋志异》故事许多源自他人讲述,篇中描写到的棋痴、琴痴形象或源于蒲松龄道听途说的素材;其五,蒲松龄所作《听张道士弹琴》,展现了他对道士琴艺的深刻感受,认为其琴声洗净尘嚣,如仙人乘风^{[14]1889};其六,因《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归极乐》中一处情节与蒲松龄所写《棋鬼》篇故事类似,都是写人物因痴迷下棋而误事的内容^[24],据此猜测,蒲松龄在借鉴其脉络结构的基础上,增添新颖的故事元素,从而完成创作。

三、蒲松龄关于棋、琴题材创作书写的超越

由上述分析,我们知道蒲松龄受淄川地域生活、亲友爱人、个人经历的影响,塑造了一批形态万千的痴者形象。但是,从艺术创新性的角度来说,他的许多痴者形象并没有超出前代小说的写作框架。这是因为蒲松龄写作的动机或者落脚点,立意劝勉、讽议、教化上。正如其友人唐梦赉之言:“今观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10]5}与前代同类型小说相比,蒲松龄唯独对棋痴、琴痴的描写真正实现了创新与超越。但在深入分析前,需了解蒲氏之前的棋、琴题材小说的创作情况。

自魏晋起,琴、棋即被视为高士雅趣的象征,如《南史·隐逸传》载陶弘景善棋琴^{[8]1207}。后世文学受其熏陶,描写角度日趋繁富:或彰显技艺超凡,如《春渚纪闻》记国手棋艺^{[25]84};或烘托文雅氛围,如《太平广记》相关情节^[26];或借以命名,附庸风雅,如《游仙窟》^[27];或隐喻世道治术,如《醒世恒言》^[28]《春渚纪闻》^{[25]148-149}论琴理;或展现人物定力,如嵇康临刑抚《广陵散》^[29];或描绘斗艺生

趣，如《韩湘子全传》^{[30]236}《禅真逸史》^[31]；或记录技法谱源，如《能改斋漫录》载棋势琴曲^[32]；或牵系姻缘情思，如《二刻拍案惊奇》棋局定终身^[33]、《莺莺传》琴诉衷肠^[34]；或点明隐者身份，如《韩湘子全传》^{[30]272}《三国演义》^[35]遇世外高人。概言之，前代作品多将琴、棋塑为高雅的精神寄托与内心信仰的象征。至蒲松龄则在此文化沃土上进行了多重创新。

一是蒲松龄在《棋鬼》与《局诈》中，通过解构“琴”“棋”等传统雅文化符号的神圣光环，深刻揭示它们在人之欲望驱动下的异化过程，并以此深入剖析人物沉溺与欺诈的心理机制，实现对僵化文化书写模式的突破。《棋鬼》篇中的主人翁并不是传统小说书写中风度翩翩的老者，也不是技艺超群的棋圣，相反，他被蒲松龄塑造成因贪恋下棋而身败名裂的落魄子弟。这就使得故事本身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棋”原指高雅之物，但正因“棋鬼”的雅癖，一步步将其拽入错失“机遇”的深渊，不仅生前家徒四壁，而且死后重生无望。可见，蒲松龄虽以“棋”为全文联络的线索，却在情节安排上将棋之意蕴与人物命运对立起来，造成立意上的极大反差，引起读者的深刻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代同题材小说罕有匹敌者。《局诈》第三则故事也是如此，篇中道士早已没有嵇康般高雅的品行，反之，他因觊觎友人古琴，不惜以欺诈手段盗取，让人观之而唾弃。这种书写，已与前代小说描写琴主人的高雅身份大相径庭，不仅如此，失德行为的情节描写，使得该小说具有了影射或隐喻之意，使人不禁发问，这难道是作者对自命不凡、安贫乐道、清静无为的道家的批驳吗？或者出于揭露两面三刀之人的丑恶行径而精心结撰？不管怎样，两则短篇将人们一贯认为的向好之物反向输出（构建人物贪痴的原始物），剥离了它们历经千年积淀浑成的光环雅称，这是蒲松龄尝试解构传统的创新精神所致，而他重塑起来的则是失去光环背景之后，平凡个体为其疯狂的行为本身，以此打开创作思路，使僵化的象征形式退于幕后，变得与众不同。

蒲松龄的“祛魅”书写实则是晚明以降启蒙思潮在小说领域的回响与深化。李贽的“童心说”对伪道学的批判、冯梦龙“三言”对世俗欲望的肯定，都在瓦解僵化的道德教条。蒲氏将矛头直指被士大夫阶层垄断并神圣化的“雅文化”，其本质是对文化权力垄断的一种文学解构。他并非否定棋、琴本

身的价值，而是撕下了附着其上的、被文化士子用以标榜身份、区隔阶层的虚伪面具。蒲氏对“雅文化”的文学解构表明，所谓的“高雅”，根基并不稳固，当遭遇人性的试探时，其脆弱性暴露无遗。而人性的展现又与人物内心的隐秘相关联，在《棋鬼》《局诈》这类故事中，蒲松龄对人物沉溺心理的细腻描摹（棋鬼的忘我痴迷）、对欺诈者精心布局的步步展现（道士的骗局），都超越了前代小说对“琴棋书画”持有者扁平化的“高雅”塑造，深入到人物的动机、心理逻辑和行为细节层面。这种对人物内在驱动力的关注和对非常态心理状态的刻画，为小说艺术向更深层次的人物内心世界探索开辟了道路。

二是蒲松龄通过时空结构的升维创新，将小说架构转化为探测人性深渊的思想实验场。《棋鬼》的结构核心在于“现世—冥界”的垂直嵌套与因果闭环。这绝非简单的空间转换或志怪元素的堆砌，而是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空间哲学架构。蒲松龄将主人公的悲剧从有限的现世时间线强制延伸并固化为无限的冥界时间。凭借这种跨越生死界限的结构，蒲氏成功剥离掉社会、道德、经济等现实层面的干扰因素，将“棋癖”置于一个纯粹的精神层面进行考察。冥府的环境如同一个剥离了所有社会伪装的“瘾癖”场域，其中，“雅癖”的伪装被彻底撕碎，暴露它作为吞噬主体性、扭曲人性、阻断生命轮回的毁灭性本质。这个闭环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宿命的象征，无论生前死后，无论处于哪个维度，人物都被同一股力量（棋癖）牢牢锁死，无法挣脱。这自然引发了一系列深刻问题：个体在面对强大的内驱力时，其选择的自由度究竟有多大？这种“沉沦”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蒲松龄通过结构本身，将这种困境有条不紊地具象为一场永无止境的灵魂煎熬。

《局诈》第三则故事的结构精髓在于构建了一个高度仿真、无懈可击的“认知陷阱”。蒲松龄的布局之妙，不仅在于骗局本身的精巧，更在于他利用叙事结构精确模拟和操控读者的认知过程。故事开端于最平常不过的人际交往——交友、谈艺、互访。蒲松龄将骗局完美嵌入日常生活逻辑的肌理之中，使得伪善演绎的舞台与真实生活的边界模糊不清。如此布局迫使读者与受害者（李生）共享同一认知起点，共同落入预设的信任陷阱。而进入该陷阱的关键枢纽在于作者对骗局的揭示采用了全知

视角下的延迟披露,即在道士得手前,读者与李生一样被蒙蔽。这种叙事策略并非悬念技巧那么简单,而是一种认知错觉:它让读者亲历被“完美欺骗”的全过程,体验认知被彻底操控而无从觉察的恐怖。当骗局揭晓时,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情节反转的惊讶,更是对自身认知能力可靠性的强烈质疑。换言之,我们所信赖的感知、理性、人际关系,都可能会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幻象。诚如是,这势必引发意识领域关于存在本质的恐慌:我们如何确信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更大的骗局之中?我们所依赖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否可靠?蒲松龄通过这个“完美犯罪”的故事,触及了人们认知局限的痛点与焦虑,其思想深度远超一般的警世寓言,具有令人战栗的现代哲学意味。

三是蒲松龄在《棋鬼》与《局诈》中寄寓对小人物的复杂情感,既包含批判其沉溺与欺诈的锋芒,又深藏着源于自身际遇的深切共情与对艺术痴迷者的微妙理解。《棋鬼》一文,尽管充斥着反讽意味,但不免也带有蒲翁深深的惋惜与同情之意。他一方面批驳“棋鬼”的不作为,另一方面又哀叹其坎坷多难的际遇,以致发出“徒令九泉下,有长死不生之弈鬼也,可哀也哉”之悲悼。笔者以为,这大抵源于蒲松龄的身世之感与悲悯情怀。从他赐予“棋鬼”的身份上看,该人物尚处人间时乃是一介书生,其父盼其早及名场,光耀门楣,然其痴迷下棋,玩物丧志,以致沦落飘零、贫苦无依。这与《聊斋志异》作者的科举之路比较起来,是大有相关性的:蒲松龄也是在痴迷科考的路上一去不返,而他得到的也是半生萧索的人生。更可悲的是,尽管蒲松龄没有不学无术,终生奋斗于场屋,但他的结局与“棋鬼”比之,实在好不过多少,基本上当是徒劳无获的。所以,他在“异世氏曰”中所凭添的伤感之情或多或少地掺杂着他个人的情怀寄寓。

除此以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还树立起悲天悯人的宏大气魄,特别是他为万千寂寂无名的底层群体塑造出生动可感的文学形象。譬如,忠肝义胆、舍生忘死的田七郎,勤劳朴拙、知恩图报的乔女。《棋鬼》篇也同样如此,这篇小说寄寓着蒲松龄深广的生命体验和博大的人文关怀。这样的写作出发点,是前代多数小说家不能做到的。例如《喻世明言·梁武帝累修归极乐》一文虽然与《棋鬼》情节上有类似,均写下棋误事的故事,但比较发现,冯梦龙关于棋物象故事的创设是逊色于蒲松龄的。

这是因为该故事聚焦于特权阶层的君王,以宣扬佛学义理为最终旨归,至于下棋误事仅作为情节的一部分服务于梁武帝精神转变的需要。

四、结语

通过对《聊斋志异》中“痴者”形象的全面梳理与分析,笔者不仅揭示了这一独特群像的丰富类别与多样面貌,而且深入探讨其成因的内外两大方面,尤其是紧密结合蒲松龄的个人生平经历,为成因研究提供更为具体而深入的视角。在淄川地域环境这一外部因素之外,蒲松龄的科考经历、幕僚生涯及设馆授学等人生轨迹,为“痴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情感基础。此外,笔者还创新性地关注“痴者”形象在书写上的创新与超越,特别是以棋痴、琴痴为例,展现出蒲松龄多方面撰写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 [1] 徐文军.《聊斋》痴说[J].蒲松龄研究,2001(03):36-45.
- [2] 张晓萍.《聊斋志异》中的痴狂人物群像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6.
- [3]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13:153.
- [4]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7:158.
- [5]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53.
- [6] 刘义庆.世说新语详解[M].刘孝,标注.朱碧莲,详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91.
- [7] 李祎.论《聊斋志异》中的痴者与痴境[J].语文学刊,2006(13):52-54.
- [8]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9] 陆游.陆游全集校注:第8册[M].钱仲联,马亚中,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90.
- [10] 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1] 蒲松龄.冯镇峦批评本《聊斋志异》[M].鲁德才,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0.
- [12] 路大荒.蒲松龄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0.
- [13] 夏荻秋.蒲松龄与《世说新语》及魏晋风度[J].蒲松龄研究,2024(01):96-107.
- [14] 蒲松龄.聊斋诗集[M]//蒲松龄全集.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 [15] 袁世硕.蒲松龄与孙蕙[M]//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65.
- [16] 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283.
- [17] 李桂奎,樊庆彦.聊斋学研究二集[M].济南:齐鲁书社,

- 2023: 15.
- [18] 张红梅. 留仙亦是酒中仙: 酒与蒲松龄的为人、作文[J]. 学术交流, 2012 (S1): 123-124.
- [19] 王昕. 《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53.
- [20] 蒲松龄. 聊斋诗集笺注[M]. 赵蔚芝, 笺注.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 [21] 孙启新. 蒲松龄赏菊诗及孙圣佐等人考证[J]. 蒲松龄研究, 2018 (03): 102-106.
- [22] 王慧. 蒲松龄与之结缘的石隐园[J]. 蒲松龄研究, 2014 (04): 146-150.
- [23] 陈东升. 蒲松龄钟情奇石[J]. 花木盆景(盆景赏石), 2001 (10): 50.
- [24] 冯梦龙. 喻世明言[M]. 许政扬,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557.
- [25]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全宋笔记[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9.
- [26]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3570.
- [27] 张文成. 游仙窟校注[M]. 李时人, 詹绪左,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6.
- [28] 冯梦龙. 醒世恒言[M]. 顾学颉, 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69.
- [29] 杨尔曾. 两晋秘史[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 575.
- [30] 雒衡山人. 韩湘子全传[M]. 林岩, 黄燕生, 校点.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 [31] 方汝浩. 禅真逸史[M].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8: 309-310.
- [32] 吴曾. 能改斋漫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16.
- [33] 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19-33.
- [34] 鲁迅. 唐宋传奇集全译[M]. 程小铭, 袁政谦, 邱瑞祥, 译注.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179.
- [35]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 572.

An Explor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Obsessed" in *Liaozhai Zhiyi*

ZHANG Ying, HUO Zhengd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Liaozhai Zhiyi* depicts a wide variety of "obsessed" figures, forming a distinctive group portrait of obsession within the text. These categories include those obsessed with gambling, love, imperial examinations, books, wine, chess, the zither, chrysanthemums and rocks. The formation of these "obsessed" images is attributed to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External factors refer to Pu Songling's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as well as his specific family life in Zichuan County. Internal factors pertain to Pu Songling'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such as his participation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his service as a secretary to local officials, and his career as a private tutor. Furthermore, Pu Songling's literary creations concerning chess and the zither transcend those of his predecessors in terms of character setting, thematic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analysis, structural arrangement, reception effects and the author's spirit.

Keywords: *Liaozhai Zhiyi*; Image of the "Obsessed"; Transcendence